

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户籍问题^{*}

袁延胜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2)

Abstract: The buildings inside the courtyards at the Han Dynasty Sanyangzhuang site in Neihua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accord with the standards of the ordinary people's houses — each house with one main room and two bedrooms, and fit in with the needs of a 'five persons' family. The dwelling area of one family is 30 Bu square (over 1700 meter square) provided by *the two years law • Hu Lü* which is recorded by the Bamboo Slip Book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from Zhangjiashan. The area of the courtyards is about 2000 meter square which is roughly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cord of the *the two years law • Hu Lü*. It shows the legal provision for the area of the courtyards may be a long-time steady system. The critical opinions from some people of the Han Dynasty on the violation of the legal provision show that the over-occupation of the field and courtyard is banned. There are croplands around each courtyard at the Han Dynastical residential site of Sanyangzhuang which might be the real reappearance of the 'Zhai Yuan' recorded by *the two years law • Hu Lü*. The 'Zhai Yuan household register' recorded by *the two years law • Hu Lü* should be a comprehensive booklet, which records people's family such as the members of family, land, courtyard, property and etc.

Key words: Han Dynastical Residential site of Sanyangzhuang; *the two years law • Hu Lü*; Han Dynasty

摘要: 三杨庄聚落遗址发现的庭院内的房屋建筑,符合汉代一般民户建筑的“一堂二内”的记载,也与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相适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 1700 多平方米。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 2000 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说“田”、“宅”都不能“逾制”,其中“宅”的面积大小的规定必定是长期存在的;三杨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

关键词: 三杨庄聚落遗址 《二年律令·户律》; 汉代

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农田和庭院建筑遗址的发现,真实再现了二千年前汉代农村的景象,对于我们认识汉代社会、经济、汉代人的居住环境等都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本文主要从三杨庄聚落遗址的房屋建筑数量、庭院遗址的面积、庭院情况等资料着手,结合文献和简牍资料,对汉代户籍问题中的家庭人口规模、汉代住宅面积的规定、“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涵义,做一初步探讨。

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的“五口之家”^[1]

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自 2003 年发现以来,目前在近 100 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已有十余处汉代庭院遗址得到确认。“发掘清理工作涉及了其中的四处,并且只有二处得到了较为完整的揭露,发掘面积总计约 9000 平方米。”^[2]

第一处庭院遗存位于三杨庄村北约 500 米。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三国简牍中户籍资料研究”(项目号:08BZS007)阶段性成果之一。

从已清理部分的情况看,应当为整座庭院(应为二进庭院)的第二进院落的一部分^[3]。从房基看,第一处庭院遗存的房屋坐西向东,两开间。南边一间南北宽(含墙体)约4.5米,估计东西长不超过6米;北边一间明显宽于南边一间,南北宽(含北墙)约5.7米^[4]。

第二处庭院遗存位于三杨庄村西北,东距第一处庭院遗存约500米。该处庭院遗存揭露较为完整,遗存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庭院从南向北由两进院落组成。第一进院由南墙、南大门、东厢房、西门房组成,第二进院由南墙、门房、西厢房、正房等组成^[5]。

第三处庭院遗存东北距第一处庭院遗存近100米。该庭院遗存揭露得也比较完整,面积大致为30×30平方米。庭院的平面布局从南向北依次为:第一进院南墙及南大门、南厢房、东西两侧院墙、第二进院南墙、正房、院墙等^[6]。

第四处庭院遗存位于第三处庭院遗存东25米,大致东西并列,尚未完整清理与揭露。平面布局接近第三处庭院遗存,只是西侧没有边沟,代之的是一行南北向的树木^[7]。

刘海旺先生指出,从目前发掘的情况看,四处庭院具有许多方面的共同性,又存在一些差异性。“从庭院的建筑品质、屋舍的数量等方面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第二处,建筑品质较高,布局较为复杂,有正房(主房或堂屋)、西厢房、东厢房、西门房四座屋舍,正房梁柱承重结构,可能为三开间,其中的东厢房为厨房,西门房可能多用于堆放农具等用具物品;另一类如第三处,布局较简单,仅有主房(堂屋)、南厢房两座房舍,主房没有使用立柱,系墙体承重,为两开间,南厢房为厨房,可能兼作它用。前一类目前是孤例,其他三处均属后一类”^[8]。

三杨庄汉代遗址内发现的第二类庭院(第一、第三、第四处庭院)中房屋建筑,符合汉代平民“一堂二内”的住宅形式。汉初晁错在建议徙民实边时,曾提议给徙边的居民建房屋,房子的标准是“一堂二内”。《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张晏曰“二内,二房也。”),门户之闭,置器

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堂即厅堂,内为卧室。《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封守”提到某里士伍甲的房屋为“一字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大木具,门桑十木(株)。”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注“一字二内,即一堂二内。……堂即厅堂,内为卧室。”^[9]

由于秦汉时期“分异”制度的影响,当时的家庭规模比较小,多为五口之家。《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晁错之言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末年全国有:户12233062、口59594978,每户平均4.87口;三杨庄汉代遗址所在的魏郡,西汉末年的户口数为:户212849,口909655,每户平均4.27口。

出土的汉简也证实汉代的家庭规模多为“五口之家”。2004年11月,在安徽省天长市安乐镇纪庄村19号西汉墓出土了一批木牍,其中出土的《户口簿》记载了临淮郡东阳县西汉早中期某一年度的户口数字。简文为:

•户凡九千一百六十九,少前;口四万九百七十,少前;

•东乡户千七百八十三,口七千七百九十五;

都乡户二千三百九十八,口万八百一十九;

杨池乡户千四百五十一,口六千三百廿八;

鞠(?)乡户八百八十,口四千五;

垣雍北乡户千三百七十五,口六千三百五十四;

垣雍东乡户千二百八十二,口五千六百六十九^[10]。

据此,西汉东阳县每户平均4.47口,其中东乡每户平均4.37口,都乡每户平均4.51口,杨池乡每户平均4.36口,鞠(?)乡每户平均4.55口,垣雍北乡平均4.62口,垣雍东乡平均4.42口。

1993年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集簿》中,记载了西汉后期东海郡某年的户口数“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卅三”^[11],每户平均5.25口。

2009年公布的《二年西乡户口簿》,记载了汉武帝早期南郡江陵西乡一年的户、口数“户千一百九十六”,“凡口四千三百七十三人”^[12],

每户平均只有 3.66 口。

从以上的各种户口数据可以看出,除了江陵西乡的户均人口在 4 人以下外,汉代的户均人口大都在 5 口左右,符合晁错“五口之家”的论述。三杨庄汉代遗址内发现的第二类庭院,仅有主房(堂屋)、南厢房,仅能满足“五口之家”的居住需要。这既说明了三杨庄遗址中第二类庭院遗存为汉代普通农民的住宅,而且也印证了汉代普通农民的家庭规模多为“五口之家”。

当然,三杨庄汉代遗址内发现的第一类庭院(第二处庭院),建筑物比较多,“居住者可能身份较高,但高到什么程度,目前尚难以断言”^[13]。从第二处庭院的房屋规模看,该家的人口应该较多,可能超过五口。但从总体上看,汉代的家庭规模平均在五口左右,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符合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存的房屋规模的^[14]。

二、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的住宅

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很大。刘海旺先生指出“如果从三杨庄遗址目前发掘的庭院情况看,四处庭院具有许多方面的许多的相同性,例如:均为封闭型的两进院;坐北朝南;占地面积大致相当(第二处庭院西侧有较大面积的水塘,较为特殊)。如果加上门前的活动场地,面积在近 2000 平方米。”^[15]庭院面积这么大,使我们联想到了秦汉时期的“名田宅”制度。

自从商鞅变法以后,秦代社会就建立了按照爵位高低占有田宅的制度。《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载“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西汉王朝建立之后,承袭了秦代的“名田宅”制度。《汉书》卷一《高帝纪》载高帝五年诏书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其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高祖刘邦在诏书

里,一方面让战争期间逃亡的人回归故里,“复故爵田宅”;另一方面,对于复员的士兵则“以有功劳行田宅”,就是按照功劳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宅。

对于“名田宅”制度的详细情况,2001 年公布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有明确的记载:

宅之大方卅步。徼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驺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

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袅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五(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欲为户者,许之。(简 314—316)^[16]

从简文看,曾犯罪的“司寇、隐官”占有“半宅”,没有爵位的“公卒、士五(伍)、庶人”可以占有“一宅”,有爵位的“公士”到“徼侯”(列侯)占有住宅的数量从“一宅半宅”到“百五宅”,差距非常大。但有军功爵位的毕竟是少数,秦汉社会的基础还是大量没有特权的自耕农,他们可以按照规定占有一处住宅。这“一宅”的面积有多大呢,简文是“宅之大方卅步”。杨振红先生说“1 步 6 尺,1 汉尺相当于 0.23 米,1 步 = 1.38 米,30 步 = 41.4 米,方三十步宅的面积约等于 1713.96 平方米。方三十步即九百平方步,‘步百为亩’,因此,方三十步为汉代九小亩(相当今 2.57094 市亩)的面积。这个住宅面积是纯粹的住房面积,还是包括庭院的面积?假如是前者,以现代人的住房标准看,当时社会基础群体的住宅面积都大得不可思议,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园圃、庭院的。”^[17]

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推算出来“一宅”的面积是 1700 多平方米,这与内黄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存面积基本相当,如果去掉庭院遗存门前的活动场地面积,则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存面积也大致在 1700 平方米左右,这与前面计算出来“一宅”的面积基本一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年代是西汉初年,内黄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存的年代是西汉后期,而二者在住宅面积上的惊人一致,这使我们得出一个初步推论:汉代住宅的大小是有规定的,而且有关住

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

汉代法律规定,凡是立户的人,都享有受田宅的权利,而且受田宅的数量要符合规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未受田宅者,乡部以其为户先后次编之,久为右。久等,以爵先后。有籍县官田宅,上其廷,令辄以次行之。”(简318)“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简313)所谓“田宅不盈,得以盈”,是说已经立户的人,如果占有的田宅数量不足,可以依法占足。如果抛开田地不论,单就住宅而言,应该是一家一户满足“一宅”的面积。《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载“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扬雄家“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有关民户的受田宅制度是一致的。“有宅一区”即有“一宅”,但“宅一区”可能更直观反映了住宅的面积,因为“区”有地域、区域的意思。此外,《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传》载:“(苏)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苏武从匈奴回来后,昭帝赐他一处住宅,即“宅一区”。

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出现了“田宅亡限”的情况。《汉书》卷十一《哀帝纪》载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诏书曰:“制节谨度以防奢侈,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东汉初年,“田宅逾制”的情况仍然存在。《后汉书》卷二十二《刘隆传》载“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以往学者多利用“田宅亡限”、“田宅逾制”的记载,来说明汉代土地兼并的情况,重点放在“田”上,而对于“宅”字关注不多,这不全面。从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存来看,汉代关于“一宅”大小的规定一直没有变化,如果超出了规定的面积,就是“逾制”。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说“田”、“宅”的数量和面积都不能“逾制”。当

然,“田宅亡限”、“田宅逾制”者是“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等“强势群体”,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既无“逾制”的资本,也无“逾制”的条件,只好遵纪守法,占有一处住宅罢了。就此而言,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存的居民,应该都是普通的汉代百姓。第二处庭院的房屋尽管多一些,但其住宅的面积与其他三家是一样的,都只有“一宅”的面积,该处庭院居民的身份应该也是普通的编户齐民。

三、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的“宅园”

三杨庄庭院遗存第三处庭院的“东西墙外分别有一条宽窄、长度大致相同的水沟,西侧水沟分为南北两段”;“庭院后(北侧)还发现有两排树木残存遗迹,从清理出的残存的树叶痕迹初步判断,多为桑树,也有榆树”^[18]。第四处庭院遗存位于第三处庭院遗存东25米,大致东西并列,尚未完整清理与揭露。平面布局接近第三处庭院遗存,只是西侧没有边沟,代之的是一行南北向的树木。“院后有一附属遗迹,与第三处庭院同位置遗存类似,可能为厕所。厕所后也种植有树木,并有一方形坑”^[19]。

三杨庄汉代庭院门口有水井、后面栽有成排的桑树、榆树,庭院两侧有水沟,这使我们想到汉代的“宅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记载了与户籍有关的五种簿籍“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谨副上县廷,皆以筐若匣盛,缄闭,以令若丞、官啬夫印封,独别为府,封府户。”(简331-332)

对于五种户口簿籍中的“民宅园户籍”,学者有不同的解释^[20]。争论之一,在于对“宅园”的理解。而讨论“宅园”,先了解一下“园”。《说文》:“园,所以树果也。”《乐府诗集·长歌行》:“青青园中葵。”《说文》:“葵,菜也。”也就是说,“园”主要是指种植果木、蔬菜的地方。有时园也叫圃。《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十一月,隐公祭钟巫,齐于社圃。”《史记集解》杜预曰“社圃,园名。”《史记》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闰月,良夫与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史记集解》服虔曰“圃,园。”《说文》:“圃,种菜曰圃。”似乎“园”与“圃”在种植方面有所区别。但实际上,汉代的园也种植蔬菜了。《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为彭城令,宣从临淮迁至陈留,过其县,桥梁、邮亭不修。宣

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数日，案行舍中，处置什器，观视园菜，终不问惠以吏事。”《后汉书》卷六十四《吴祐传》：“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径去。冀遂出祐为河间相，因自免归家，不复仕，躬灌园蔬，以经书教授。年九十八卒。”《居延汉简》506简^[21]：

韭三畦 葵七畦
城官中亭治园条 其故多过条者勿减
葱三畦 凡十二畦 506·10A
界亭 506·10B

从居延汉简看，当时的亭园种植有韭菜、大葱、葵等蔬菜。“园”中种蔬菜，并不表明园中不种果树，实际上，正如《说文》所说“园，所以树果也”，“园”在种植蔬菜的同时，也种植果树。《汉书》卷63《武五子传》：“胥宫园中枣树生十余茎，茎正赤，叶白如素。”总之，汉代的“园”主要是指种植果木，蔬菜的地方，可能有时也包括桑、榆等实用性树木。《汉书》卷24上《食货志》：“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其中“还庐树桑，菜茹有畦”，可能就是指“园”的情况。

如前所述，汉代宅的面积较大，因此有前室后园的记载。《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所谓“舍园”应是房后之园。《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载桓荣“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贫窶无资，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所谓“家园”，应是家中之园之意，很可能就在住宅后面。又《汉书》卷七十七《孙宝传》：“稚季耳目长，闻知之，杜门不通水火，穿舍后墙为小户，但持锄自治园，因文所厚自陈如此。”所谓“穿舍后墙为小户，但持锄自治园”，明确说明“园”在舍后，即房屋后面。由此可见，汉代由于宅子面积大，除了一部分建房舍外，还有一些空地作为种植蔬菜、瓜果的“园”。

1981年河南淮阳于庄汉墓出土了一组大型彩绘陶院落。该院落长1.30米，宽1.14米。陶院落分两大部分：东部为陶院，西部为田园。陶院为三进的院落，由前院、中庭、后院组成，是

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田园位于院落的西侧，套于院墙之内，“园内南部是旱田，共22垄，中间有灌溉沟和土埂。向北64厘米处有一井，有水沟可以灌溉，向北共4节，流向两边畦内。水沟的垄埂高出地面，其北端有一下水孔。后有角门可供出入”^[22]。刘兴林先生认为于庄陶院落所属的农田模型，“应该就是汉代宅田的一种形式。田块内苗孔排列整齐，或成畦分布，或独占一垄，又田块形式分为明显的三种类型，南段为小田块，中段突出垄台，北段则有灌溉之利（报告称为水田），可见其多种经营的形势。不过，开于庭院之内的田地，面积当不会太大，所以不大可能种植大田作物，说它是菜地更为合理，而分割成小块畦田的做法也正是园艺生产所必需”^[23]。笔者认为，于庄陶院落所属的田园模型，正是“宅园”的“园”。从模型看，田是在院落之中的，而且是种植蔬菜的，这不正是史书所载的“舍园”、“家园”吗？

从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第三处、第四处庭院后面的“两排树木残存遗迹”看，应该是宅中之“园”。当然，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的“园”中也可能种植有蔬菜瓜果，只不过这些遗迹不易保存，今天没有发现罢了。或许，在以后的庭院遗址发掘中，会发现这类遗存。如果真是如此，则汉代的“宅园”有了直观的体现。我们期待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的进一步发掘，来丰富我们对汉代“宅园”的认识。

总之，结合三杨庄庭院遗址，笔者认为《二年律令·户律》中的“宅园”应是指“宅”及宅的附属地“园”的情况，“园”可以种植蔬菜，也可以种植果树和其他树木，如桑树、榆树等。而“民宅园户籍”则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簿籍。

[1] 这一部分的相关内容，刘海旺先生在论述三杨庄汉代遗址的性质时从不同角度提到了。本人赞同刘海旺先生的观点，并在他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简牍资料，进一步阐明汉代家庭多为“五口之家”。刘海旺先生的论述见：刘海旺，首次发现的汉代农业闾里遗址——中国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初识[M]//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北京：中华书局，2006.64-76；刘海旺，新发现的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性质初探[M]//卜宪群，杨振红，简帛

- 研究 2006.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93-301.
- [2] [3] 刘海旺. 新发现的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性质初探 [M] // 卜宪群, 杨振红. 简帛研究 2006.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96.
-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 [J]. 考古: 2004 (7): 35.
-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 [J], 考古, 2004 (7): 36; 刘海旺. 新发现的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性质初探 [M] // 卜宪群, 杨振红. 简帛研究 2006.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96.
- [6] [7] [8] 刘海旺. 新发现的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性质初探 [M] // 卜宪群, 杨振红. 简帛研究 2006.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97-300.
- [9]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 睡虎地秦墓竹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0: 149.
- [10] 天长市文物管理所, 天长市博物馆. 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 [J]. 文物, 2006 (11): 11.
- [11] 连云港市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 东海县博物馆, 中国文物研究所. 尹湾汉墓简牍 [M], 1997: 77.
- [12] 朱江松. 罕见的松柏汉代木牍 [M] // 荆州博物馆编. 荆州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209-212.
- [13] [15] [18] [19] 刘海旺. 新发现的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遗址性质初探 [M] // 卜宪群, 杨振红. 简帛研究 2006.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97-301.
- [14] 刘海旺先生指出 “除第二处宅院能够居住超过五十口以上的家庭成员外, 其他的宅院最多能够容纳五口人。” 刘海旺. 首次发现的汉代农业闾里遗址——中国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初识 [M] // 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64-76.
- [16]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 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释文修订本)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52.
- [17] 杨振红. 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27-128.
- [20] 王彦辉先生认为 “律文中的‘宅园户籍’是民户立户时必须向官府登记家庭人口、各类财产的最全面的记录, 称为‘宅园户籍’本身就说明户籍的登记内容包括家产, ‘宅园’二字不过是对所有财产的概指。” 杨振红先生认为 “‘宅园户籍’, 表明当时还有专门用以记录民户宅园情况的簿籍。” 臧知非先生认为 “宅园户籍是住宅、园圃、房屋数量的综合登记。” 论述参见: 王彦辉. 从张家山汉简看西汉私奴婢的社会地位 [M] //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 秦汉史论丛 (第九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235; 杨振红. 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35; 臧知非. 简牍所见汉代乡部的建制与职能 [J]. 史学月刊, 2006 (5).
- [21] 谢桂华, 李均明, 朱国炤.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609.
- [22] 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 淮阳太昊陵文物保管所. 淮阳于庄汉墓发掘简报 [J]. 中原文物, 1983 (1).
- [23] 刘兴林. 汉代农田形态略说 [J]. 农业考古, 2009 (1): 160-161.

(责任编辑: 武 玮)